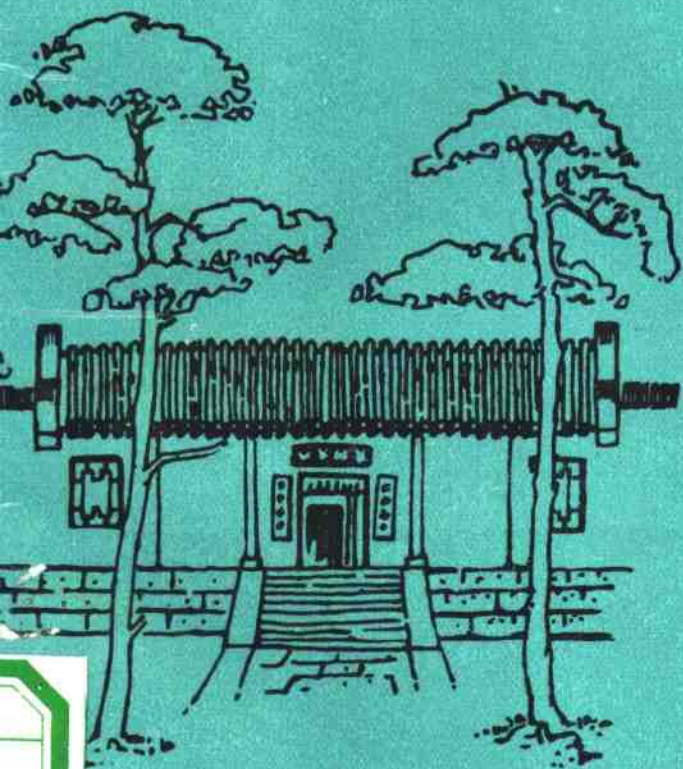


陈谷嘉 主编

岳麓书院名人传

湖南大学出版社





2 034 0771 3

岳麓书院名人传

陈正嘉

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延绵千余年，办学不止，为举世罕见的千年学府。她在中国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高等学府，人才辈出。既有著名山长，又有著名生徒，既有经世济国之材，又有著述宏富的思想家；还有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本书着重叙述了张栻、朱熹、胡宏、王夫之、张元济、王先谦、陶澍、曾国藩、魏源、左宗棠、杨昌济等人在岳麓书院讲学或学习情况及他们的历史地位或学术影响。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教育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和史学、教育界研究人员的工作参考书。



岳麓书院名人传

陈谷嘉 主编



湖南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东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8.0625印张 196.6千字 5插页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314-00227-4/G·36]

定价：3.20元

60701/14

● 前 言

《岳麓书院名人传》的写作，酝酿已有三年了。原计划在1985年完稿，但由于教学和其它研究工作所累，故直到1986年年底才正式开始写作，到1987年8月完稿。

岳麓书院从创建至今已有千余年，办学连绵不绝，一直为高等学府所在地。于余年来，不仅有许多学者在此主持书院工作和讲授学术，而且培养了大批的人材，检视史实，代有闻人。岳麓书院人材之盛史书屡有称道。清代人据史撰楹联，称“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至今悬挂书院大门两侧。游人至此，伫立门前，既为岳麓斯文所吸引，又对楹联之意多有不详，故常有问者，意欲从中得到历史启迪。我们虽有应答，但总不能如人之意。为此，产生了我们写作此书的最初动机。

随着书院文化史研究的深入，我们深感书院的历史虽有它自身发展规律，但历史总是社会活动家行动的参与构成的。因此，研究书院的人物活动乃是书院文化史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何况出人材又是衡量书院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尺。惟其如此，所以最终促成了我们写作此书。

岳麓书院千年以来，人材辈出，我们不可能一一写到，又因人物复杂：既有著名山长，又有著名生徒；既有出将入相的经世济国之材，又有著述宏富的思想家，还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著名人物，难能全面顾及。我们在草拟写作提纲时，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凡各个方面的人物，入正史者尽量收入。又考虑到篇幅和活动家的知名度，有的人物安排了

专章，有的则以人材群体出现的。当然有些人物如胡安国、胡宏等列入人材群体，并不妥当，但国学派的联系和篇章的限制只好如此安排，以后如有机会当另章专论。

本书所写人物，往往涉及到政治、学术、教育乃至军事方面，我们打算对这些历史人物作全面的评价，多取材与岳麓书院有联系的活动部分，因此读者不能作评传看待。再有，某些人物的历史评价目前史学界尚有分歧，对此，我们没有作全面的评价；有些人物虽铸成历史大错，甚有成为历史罪人者，但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参照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对他们虽在历史上所作过的好事给予了一定肯定。我们肯定他们并不是要抵消其罪过，而是力图把历史活动家置于历史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去考察和评价，把历史人物当作过程研究。另外，由于第一章是属总论性质，企图对全书基本思想作出概括，因此难免与后面章节内容有重复之处。

本书写作提纲由我拟定之后，约请了本所朱汉民同志承担了第五章和第九章的写作任务，此外，他还为第四章提供了部分初稿。第八章，由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李汉武同志对魏源有多年研究，所以约请他执笔。其余六章由我执笔并负责全书统稿。由于自己学疏才浅，特别是写作时间安排过紧，很多问题来不及深入细究。疏漏和错误之处定所难免，请同仁和读者不吝指教。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湖南大学出版社李晓钟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本书写作过程中也参考和吸取了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谨以致谢。

编著者 陈 谷 嘉

1987年8月

● 目 录

第一章	湘楚人材的摇篮——岳麓书院·····	(1)
	千年历史沿革述略·····	(2)
	教育传统及特点·····	(7)
	学术传统及特色·····	(13)
	爱国主义传统·····	(20)
第二章	著名理学家张栻·····	(27)
	张栻的生平·····	(28)
	张栻的理学思想·····	(34)
	张栻的教育思想·····	(45)
第三章	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	(53)
	生平与著述·····	(53)
	朱熹与岳麓书院·····	(59)
第四章	湖湘学最盛·····	(72)
	湖湘学派是个人材群体·····	(72)
	湖湘学派的奠基人胡宏·····	(76)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胡寅·····	(80)
	“一时之英才”——吴猎·····	(86)
	忠鯁之臣彭龟年·····	(90)
	开禧北伐功臣——赵方·····	(94)
	锐志当世游九言、游九功兄弟·····	(97)
	“光于世学”的张忠恕·····	(102)

第五章	“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夫之·····	(105)
	颠沛而战斗的一生·····	(105)
	湖湘学是船山学术的重要渊源·····	(113)
	“真通天人之故”的学术思想·····	(120)
第六章	著名山长举例·····	(127)
	以“大贤自许”的张元汴·····	(127)
	以“扶持世教为任”的李文照·····	(132)
	“卓然为一代鸿儒”的王文清·····	(140)
	“湘人无不崇仰”的欧阳厚均·····	(147)
	“季清巨儒，著书满家”的王先谦·····	(154)
第七章	“中兴将相，湖湘什九”·····	(161)
	“千国良臣”陶澍·····	(162)
	“生平取与，一准于义”的贺长龄·····	(167)
	中国第一个出任外国使臣郭嵩焘·····	(173)
	“桐城——湘乡派”盟主——曾国藩·····	(180)
	规复新疆，对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的左崇棠·····	(188)
	“察吏严而不没一善”的胡林翼·····	(194)
第八章	师夷长技，近代先驱——魏源·····	(201)
	魏源的生平事迹·····	(201)
	魏源的著述和主要思想·····	(221)
第九章	“欲栽大木柱长天”的杨昌济·····	(233)
	早年求学，肄业岳麓·····	(233)
	杨昌济与湖南教育事业·····	(237)
	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241)
	“智、德、体之三部”的教育思想·····	(247)

● 第一章

湘楚人材的摇篮——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名闻天下，在宋代便被学人称为“天下四书院”之一。以后对“四大书院”具体所指，虽然说法不一，但岳麓书院之归四大书院之列，学者从无异议，历千年来已成公论。由于世事沧桑，古时的著名书院大都办学不继，或者早已烟灭无闻，或者已成历史的陈迹。有的虽有故址遗存，但只能作为文物而供人凭吊和参观。唯独岳麓书院例外，自创办始，时至今日，中间除了元代近百年停办和间断外，一直弦歌不绝，办学不辍。在此办学千年相继，连绵不绝，举世少见，故又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众所周知，评价一个学校的地位和作用，其衡量标尺则是出人材和出成果。人称岳麓之盛，恰在此处。南宋时期，岳麓人材济济，在此形成且在理学中影响最盛的湖湘学派，便是一人材群体。《宋元学案》特为之作《岳麓诸儒学案》和《南轩学案》，以揄扬岳麓人材之盛。其后，历千年中，人材相继而出，代有闻人，岳麓出身的杰出思想家王夫之、魏源早为人知。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继南宋之后，又形成了一个人材群体，致有“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之称。从岳麓出身的陶澍、魏源、郭嵩焘、曾国藩、和左宗棠等，都是叱咤历史风云的人物。清代学人所撰且今悬挂在书院大门两侧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楹联，便是对

岳麓人材之盛的写照，也是对此评价的历史见证。

据不完全统计，岳麓师生事迹彪炳于汗青者，仅为正史立传者便有二十六人之多，传列省志中则更多。岳麓书院曾是湖湘学派的重镇，对湖湘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南轩先生讲学湘中，蜀人多从之”，实际上从学者不仅四川，诸如江西、浙江、江苏等都有学生求学岳麓。《宋元学案》称岳麓诸生“成功立业”者多，出播政声，处范风俗，参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领域，自不待言，这些都说明了岳麓书院的历史地位和对历史所作出的贡献。

千年历史已经证明，岳麓书院是培养湘楚人材的摇篮，大批人材经过她的精心抚育脱颖而出，与其说岳麓书院人材之盛，倒不如说岳麓书院办学有方，治学有道，经验可鉴。因此，在述及岳麓名人时，有必要将岳麓书院历史及教学和学术等传统加以缕析。俗语说：“人不教不成材”即是古人称之为圣贤的人也是教育的结果。毫无疑问，岳麓书院出现的大批经世济国之材，都与其母校——岳麓书院的精心教育分不开的。

千年历史沿革述略

岳麓书院座落在历史名城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下。后托青枫峡、爱晚亭，茂林修竹，葱笼滴翠；书院前有马路直达湘江边，天马、凤凰两山分峙两旁，俨若天然门户，静静的湘江从门前流淌北去。明清时期遗存的古书院建筑群，轮廓依然，经过修葺，掩映于山水幽深之中，其景象更为壮观。青年学子展读夜习于斯，人称难得的斯文之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湖南大学，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使古老的书院踏着时代的步伐，正在朝着文、理、工、经、法综合性的新型湖南大学迈进。文化古城的明珠，更闪耀着青春的异彩。

根据史书记载，岳麓书院为潭州太守朱洞于北宋开宝九年（976）所创建，距今已有千余年。如果从南宋淳祐年间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守道的记述看，岳麓书院的创始时间尚可推到唐末五代。欧阳守道在《巽斋文集》记道：“往年余长岳麓，山中碑十余，寻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开元中为僧寺撰，其一记国初建书院志撰者名。碑言书院乃寺地，有二僧，一名智璇，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家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手。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虽然此碑文不传，无从稽考，但欧阳守道曾亲眼所见，他依据宋初创院的碑刻纪述其事，当为可靠。因此，岳麓书院实际上是在唐末僧人智璇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成，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末五代。到北宋开宝九年，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建立岳麓书院。这时已不是旧时的学舍，而成为拥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的规模宏敞的书院。故僧人寺地办学虽为书院之前身，但书院规模实创立于北宋开宝九年。

世事沧桑，在千年历史变化中，岳麓书院屡经兴废，饱经风霜，仅遭兵火之劫便有七次之多。由于朱洞去职潭州，书院一时得不到有力支持，因此曾出现“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的冷落局面，直到咸丰二年（999）李允则知潭州太守时才恢复生机。李本是儒臣，对兴文教身体力行，所以岳麓书院经李主持很快得到恢复和扩建。在恢复和扩建岳麓书院期间，李允则“尽获故书，诱导青衿，肯构旧址。外敞门屋，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象，画七十二贤……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典。”

（王禹偁：《小畜集》卷十七）制订书院规制即讲学、藏书和祭祀三个部分。书院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其他从学者不在此数，办学已具相当的规模。朝廷因岳麓书院办学有成绩，故纳李允

则的奏请，乃拨书赐岳麓书院，所赐者计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史籍。当时岳麓书院致有“潇湘洙泗”之称誉。北宋王禹偁在《潭州岳麓书院记》称说：“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把岳麓书院与孔孟之乡“洙泗”、“邹鲁”相比论，可见当时书院之盛。

北宋王朝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宋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上的专制，振兴衰落中的官学，也为了遏制书院的发展，曾三次厉行兴办官学的运动。在官学运动的冲击下，书院遭到极大挫折。有的变为官学，有的被废弃。同样，岳麓书院也难免遭难。绍兴四年（1097）朝廷下令废弃岳麓书院，将书院改为鼓铸场，岳麓书院面临着生存的威胁。但岳麓书院因为名闻遐迩，早已为人拥立，所以朝廷旨令下达便有人反对，湘阴尉朱谔以“乡校不可毁”为由拒旨不行，虽他官微言轻，由于岳麓书院影响之大，故朝廷也只好收旨作罢。岳麓书院不仅没有在官学冲击下而沉寂，相反的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进入到了它在北宋发展最繁荣阶段。大中祥符五年（1012），湖南湘阴人周式任山长，他以“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周式主教岳麓书院，办学规模大大扩展，由原来定额六十余人，发展到数百人，周式为此请太守刘师道扩建斋舍。虽然当时谭琦作记曾述此事，可惜原记不存，斋舍具体扩建情形不详。但对从学人数，朱熹在《南岳处士吴君行状》中曾有记述。他说：“长沙故有岳麓书院，国初时，郡人周式为山长，教授数百人。”（《朱子文集》卷九十七）岳麓书院从院舍规模、从学人数，都比以前有很大的发展，风闻天下。大中祥符八年（1016），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岳麓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又感周式的学行义著，授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朝廷效命。但周式坚请不就，乞求归山掌教。真宗为他执教之心

不移所动，乃赠对衣鞍马、内府书籍。而今书院所存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总之，在北宋时期，岳麓书院不仅规模较大，且有天下四大书院之称。

岳麓书院进入南宋时期，发展尤盛。虽因金兵南侵，一时毁于兵火，但不久即乾道元年（1165）由湖南安抚史知潭州刘珙再重建。刘珙本为儒生，一生以尊儒重道为己任，他与著名学者朱熹、张栻关系密切，交谊很深。刘珙到职湖南，对发展文教很重视，“葺学校、访雅行，思有以振之”（《宋史》本传）。他为了重建岳麓书院，特授命郡教授郭颖主持其事，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不但恢复了书院昔日旧观，而且又有扩建。书院有屋五十楹，并“肖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于书堂之北。”特别是他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教育上和学术上的地位。张栻主教岳麓，一时群英踵至，人文荟萃。从学者广及东南数省，人数达千人之多，为岳麓书院历史上空前所未有。人材济济，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岳麓书院因而成为湖南学派活动的基地。另外，朱熹闻张栻得衡山五峰学，专程访问岳麓，与张栻切磋学术，更是推动了岳麓学术的发展，推动了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朱张岳麓会讲是岳麓书院史上一件盛事，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所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南宋时期，岳麓书院经张栻主教、朱张岳麓会讲，再经朱熹绍兴五年（1194）任湖南安抚史时的整治，在教育上和学术上都进入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和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深刻影响以后岳麓书院千年历史的发展，在岳麓书院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书院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是属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的存在

和发展必然要受政治和经济诸方面的制约，所以岳麓书院的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体现这种曲折过程，便是岳麓书院在元、明、清三代的时兴时废，兴衰交替。这个兴衰曲折大体经历了如下一个过程：宋末衰落，元代重建。明代岳麓沉寂又复兴；清代岳麓官学化，书院改学堂。

岳麓书院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因此它的兴衰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兴衰。毫无疑义，随着清末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封建制度的衰落，岳麓书院同样面临着历史的严重考验。很显然旧的书院传统已不能适应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相反的成为历史前进的包袱，因此书院改学堂，或者说废书院兴学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在这个变革的关键时刻，岳麓书院又经受住了一次严重的历史考验。它适应历史的变化，实行教育内容的改革，增添“新学”科目，倡导西学，注重时事，一时书院成为维新变革活动的基地之一，虽然遭到保守顽固派叶德辉等人的反对，但进步力量始终左右着书院的前进方向，终为书院的改革准备了条件。1903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奏请朝廷改岳麓书院为高等学堂，从此延续千年的古老书院走向了近代教育的新阶段。如同历史上朝代嬗变一样，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覆亡了，但是历史依然连绵不已，岳麓书院改学堂之后，作为封建制度的岳麓书院已不复存在了，但它以一种近代学堂的姿态步入新的时代，古老的书院焕发了青春活力。旧的书院改学堂，虽然是教育体制改革上质的变化，但书院千年历史并不因此而隔断。由书院改学堂，由学堂而学校，由学校而湖南大学，前后相承，千年相继。岳麓书院或说湖南大学有千年历史，都体现了历史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体现了岳麓书院发展和变革的历史过程，岳麓书院至今即湖南大学，越过三个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

社会三个社会形态，不断发展，说明了它具有办学始终不离时代的轨迹而跟随时代前进的优良历史传统。

教育传统及特点

岳麓书院作为一种书院教育，它虽有一般书院的教育特点，但还有自己的独特教育传统。严格地说，岳麓书院形成富有特色的教育传统，是南宋时期张栻主教奠定的基础。以后虽不断发展，但始终未离张栻教育思想的影响。元代理学家在追溯岳麓书院长兴不衰时说：“岂不以先生（即张栻）经始之功不可以废而莫之续也乎！”这道出了历史的真情。

张栻是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岳麓书院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有代表性。凡办好一个学校，对于人材培养目标的确是十分重要的，其教育原则和方法都是依此而定的。宋明时期官学之所以培养不出人材，学术不兴，僵化而无生机，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它以科举利禄为办学之宗旨，追求的培养目标是功名仕进。相反的，书院之所以兴，而与学派的活动紧密联系，也表现在它培养人材的目标上。追求什么样的培养目标，这是官学与书院办学宗旨的一个重大区别，不同的教风和学风均由此产生。张栻为岳麓书院所定的培养目标与官学不同，他在《岳麓书院记》一文中为培养人材目标规格作了描述，说：“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盖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前两句是对学校存在弊端的批评，也是他所要纠正的弊害，后一句则是他对人材模式的规格设想。这三句话的内容是前后联系的，前二句是提出问题，后一句是答案和结论。前两句旨在说明办学校不是为了科举，更不是图取功名富贵以期跻身官场的跳板。教育不

应缀辑文辞，求之词章雕琢之末。对后一句即“盖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张栻未作具体解释，但其他材料对此却作了注。他在作胡广仲墓表时曾说：“操主于忠厚，为学谨于人伦，贵实用而耻空言”（《文集·钦州灵山主簿胡君墓表》），实际上他在此提出了人材模式的具体设想。而组成这种人材规格的要素则有四点：一不是“争驰功利之末”，从正面言之，是要“公天下之理”，“无物我之私”；二是要有“事天保民之心”，致君泽民；三是要道德学问并进，“明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有良好的道德品格；四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忠臣孝子。综括以上四点，便是张栻所说的“传斯道而济斯民也”的人材培养的具体目标。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张栻所主张培养的人材乃是经世致用的醇儒，或者说是真正的儒生。宋代社会，儒生是封建国家官吏的主要后备军，除了部分官来自军功和任荫授予以外，大部分是从科举中拔选。“宋之以进士入仕者冗，尝数倍于唐。”（《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二）。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亲自复试录取五百人，以后沿此例每年录取数百人，是时甚至达到千人数，大大超过了唐代，唐代录取进士一般不过二、三十人。然而统治者所重视的是仕取儒生，而对儒生的严格培养教育却被忽视，以致科举单纯成了追求功名利禄的跳板。张栻提出的人材培养目标，便是要改变这种弊病，即不在仕取儒生，而在于对儒生进行严格的培养教育，培养儒生不是为作官而是为了治国安民；作官不单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要“致君泽民”，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服务，使学校的人材培养目标与封建国家所需求的人材相结合。从官吏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和安危而言，张栻的人材目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张栻提出的人材培养目标，为以后岳麓书院历届山长所奉行，培养经世致用的儒生，成为了岳麓办学的重要传统，反对追求单纯的功名利禄，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岳麓书院几乎每一次修复和重建都要重新提出办学的宗旨。如元代刘必大重建时，便把“熟于记诵，工于辞章，优于进取”作为弊病进行反对。对于科举弊病的革除，即是到清朝末年也是坚持不懈。岳麓书院最后一个山长王先谦，仍然坚持办学的传统，反对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反对教育专于八股之艺，他指出“所务在名，所图在利”，是把学生引到了邪路，“官满天下，而无以实以继之，则仍然一空”（《虚复堂书札》）主张引导学生从功名利禄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而致经世实用之学。

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在以后岳麓书院的山长中还发展了张栻的思想。清代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是其中之一。欧阳厚均提出：“以蕲培植人材为有体有用之学”和“不徒区区文艺之末也。”（《岳麓课艺之集序》）他说的“体”相当于张栻的“传道”，但不仅如此而已，他还提出了“用”。欧阳厚均把“体”和“用”引到人材培养方面，即既要求学生立志作一个“致君泽民”的经世济国的人材，又要求学生具有“用”的知识，有应变社会生活的能力。只有“体”和“用”相具备的人材，才有可能“出为良臣，处于良士”。这种体用结合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似已注意到了培养官吏后备军以外的各种实业人才的必要性，自不待言这发展了张栻的教育思想。

与人材培养目标相适应，岳麓书院形成了自己一套教育特色。首先，书院始终把学生的品德培养放在教育的首位。从张栻开始，几乎都把教育看成是伦理道德教育。张栻说：“尝考先王以建学造士之本意，盖将使士者讲夫仁、义、礼、智之辨，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伦，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事盖甚大矣。”（《张南轩先生文集》61页）如何严格地对学生进行品格道德教育呢？主要有二点：（一）把儒家经典作为基本教材，张栻曾指出：“今日之患，是不悦儒学”，作为一个儒生必须具备的政治道德品质，有赖于儒家思想的灌输和潜移默化，“儒者之政，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本为先导，本固邦宁。”因此，儒家思想始终是岳麓书院学生学习的基本内容。（二）实行严格的道德修养。从张栻开始便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成是道德修养的过程。他说：“至于格物致知，而仁义礼智之弊，得于其性；父子、兄弟、夫妇之伦，皆以不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宜者。此先王之此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后世不可以跋及者也。”（《张南轩先生文集》51—52页）岳麓书院南宋时期的“忠孝仁爱”的校训，至清代发展为“整齐严肃”、“实事求是”，便是学生藉以进行道德修养的规范。如果说，在南宋时期岳麓书院还偏重于道德知识的灌输，那么明清时期则重于道德实践，重视在行为上规范学生，儒家的教义变成了学生行为上遵守的具体学规。清代山长王文清手定的至今嵌在讲堂右壁的《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条，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本学规除了六条谈到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以外，其余十二条都是道德方面的内容，是学生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本学规在第六章有专门分析）。岳麓书院严格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确实造就了一大批勇于践行封建道德的学子，涌现了一批对国尽忠和关心民瘼的人材。

其次，重视学生主体精神的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精神，也是岳麓书院的重要特色，在处理教和学的关系中，它确给后人留下了可借鉴的经验。如果说，德育是发掘人的潜能的重要条件，促成立志和树立良好的学习态度等方面起重要作用，那么学习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使知识转化为自有和智